政治科學論叢 / 第 65 期 / 民國 104 年 9 月 / 頁 31-70

# 影響大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關鍵因素：政治壓力還是經濟利益*

郭建中**、王國臣***

## 摘　要

本文利用追蹤資料邏輯模型，檢證大國對 102 個開發中國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s）的政經動機。研究對象爲中國大陸、法國、德國、日本、英國與美國；研究時間 1987-2012 年。研究發現：第一，大國簽署 BITs 的關鍵因素依序是，競爭壓力、地主國的經濟資源，以及保障海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很顯然，大國簽署 BITs 的首要考量爲政治壓力，其次才是經濟利益。第二，大國競簽 BITs 的壓力來源爲：決策者對於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例如：美國旨在爭取 BITs 標準設定的制高點，維繫其國際影響力。因此，BITs 數量並非其競簽壓力來源。反之，中國大陸擔心 BITs 產生的投資移轉效果，造成永續發展的國內能源供給斷鏈問題。所以，即使中國大陸的 BITs 數量高居世界第二，但其競簽壓力依舊沈重。

關鍵詞：大國競爭、大國經濟外交、追蹤資料邏輯模型、新古典現實主義、雙邊投資協定

---

* DOI:10.6166/TJPS.65(31-70)；作者感謝 3 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與指正，讓本文的論述更加嚴謹。如尚有疏漏，完全是作者的責任。

**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jj03082011@gmail.com。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E-mail: 97261502@nccu.edu.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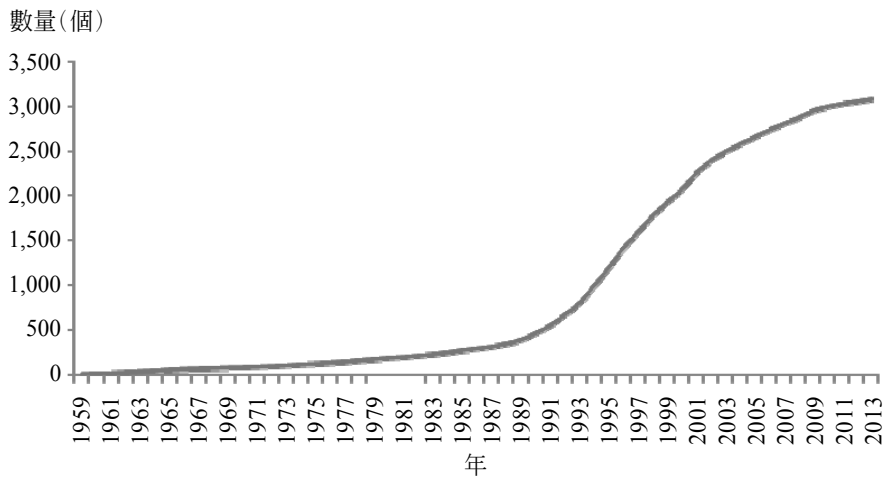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104 年 1 月 16 日；通過日期：104 年 9 月 1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壹、前言

聯合國貿易開發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指出，過去三十多年，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的數量呈現爆炸式成長，從 1980 年的 178 個竄升到 2013 年的 3,081 個。很顯然，簽署 BITs 已蔚爲風潮（見圖 1）。

**圖 1　世界各國已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1959-2013 年）**




資料來源：UNCTAD (2014a: 114-134)

受此影響，BITs 已成爲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截至 2014 年 11 月底，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資料庫共收錄，143 篇探討 BITs 的學術論文；其中，近七成的發表時間，都集中在過去 5 年。此外，2009 年，牛津大學也邀請，UNCTAD 官員與該領域的研究先驅——Vandevelde、Salacuse、Neumayer、Egger、Büthe 與 Milner，共同討論 BITs 對國際政經體系的影響（Sauvant and Sachs, 2009）。換言之，研究 BITs 兼具理論與實務雙重意涵。

特別是 2014 年，*World Politics* (WPO)——國關領域影響力（impac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actor）排名第二的期刊，更以專刊形式，匯整 BITs 的最新研究進展。WPO 編委會的共識爲：BITs 是權力運作的結果。締約雙方權力愈不對稱（asymmetry），則 BITs 的內容愈符合大國期待。反之，雙方權力愈互賴（interdependence），則 BITs 愈有利於開發中國家（Milner, 2014: 1-11）。

但可惜的是，WPO 忽略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沒有說明大國偏好。WPO 只發現，大國會施壓小國簽署 BITs。然而，權力只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Waltz, 1990: 21-37），他們卻未加深究，大國積極洽簽 BITs 的動機。這表示：此議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是沒有考量大國間相互競爭。WPO 只注意到，開發中國家相互競逐資本（capital competition），卻忽略大國間也存在競爭。例如：前美國副國務卿 Zoellick 強調，美國尋求 BITs 夥伴的目的是，抵銷他國 BITs 可能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傷害（Destler, 2005: 301）。很顯然，大國間的政治角力也是簽署 BITs 的重要因素，這是先行研究忽略之處。

據此，本文藉由追蹤資料邏輯模型（panel data logit model, PDLM），檢證 1987 至 2012 年，中國大陸、法國、德國、日本、英國，以及美國等 6 個投資大國，對 102 個開發中國家簽署 BITs 的政治與經濟動機。在章節安排上，第二部分先行梳理相關文獻，進而建立四項研究假設。第三部分爲研究方法，依序說明資料分析方法、實證變數與資料來源。第四部分爲實證結果分析。第五部分再依循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分析架構，並以中美兩國爲案例，詳細論證投資大國競簽 BITs 的質化因素（qualitative factors）──壓力來源與調適策略。最後則是結論。

##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雙邊投資協定（BITs）的研究歷程，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是 1980-2000 年的國際法研究階段；二是 2000-2009 年的國際經濟研究階段；三是 2010 年迄今的國際關係研究階段。本文依循此一發展脈絡，建立四項研究假設，論證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以下依序說明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一、雙邊投資協定的研究進程

BITs 的研究發軔於國際法學者，他們關注的焦點爲 BITs 的普遍性框架。例如：Salacuse (1990: 655-675) 與 Vandevelde (1998: 621-641；2000: 469-502) 研究發現，完整的 BITs 應涵蓋三大部分：首先，給予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s）公平及合理的待遇（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國民待遇，以及最惠國待遇。其次，提供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的保障，包括資金的自由移轉、徵收與損害賠償。最後，投資爭議交付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進行仲裁。換言之，開發中國家希望透過 BITs 的簽署，擴大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可惜的是，國際法學者沒有對 BITs 與 FDI 兩者相關性，進行量化實證研究。

但隨著網際網路的高速發展，跨國統計數據的取得更加便利。因此自 2000 年起，國際經濟學者開始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大規模檢證 BITs 對 FDI 的促進效果。例如：Neumayer and Spess (2005: 1567-1585) 利用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檢證 1970-2001 年 120 個國家吸引 FDI 的決定性因素。結果顯示，簽訂 BITs 對開發中國家吸引 FDI，具有正向影響。UNCTAD (2009: 323-348) 的實證結果，支持上述學者的研究發現。

但是，Egger and Pfaffermayr (2004: 788-804) 的量化結果卻顯示，BITs 與 FDI 不具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10%）。Hallward-Driemeier (2009: 349-379) 與 Yackee (2008: 805-832) 也證實，BITs 與 FDI 彼此間沒有因果關係。很顯然，這些量化實證結果相當分歧（Berger et al., 2011: 270-272）。

究其原因，影響開發中國家吸引 FDI 的因素很多，BITs 只是其中之一，還包括地主國的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即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的消費市場、低廉的勞動成本、關鍵技術與先進知識（Dunning, 1998: 45-66）。此外，經濟學者也忽略國際政治現實 ── 大國才是國際體系的決定者（Keohane and Nye, 1989）。換言之，在各種因素的交互干擾下，我們很難釐清 BITs 與 FDI 間的經濟因果關係（Milner, 2014: 1-11）。

據此自 2010 年起，國際關係學者轉而探詢，世界各國簽訂 BITs 的動機。例如：Poulsen and Aisbett (2013: 273-313) 研究發現，開發中國家簽署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ITs 的意願，其實非常低，因爲他們很難與大國進行對等的跨國訴訟。這表示：大國是促成 BITs 快速擴張的主要動力。

Allee and Peinhardt (2010: 1-26；2014: 79) 進行更全面的檢證。他們利用機率單位模型（probit model），分析 1959-2006 年 170 個國家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結果顯示：兩國權力差距愈懸殊，則 BITs 的保障強度愈高。這支持上述學者的研究發現。其次，右翼政黨傾向制訂更嚴格的 BITs，表示大國偏好也會影響 BITs 的內容。第三，大國擁有的 MNEs 數量與 BITs 保障強度，兩者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10%）。換言之，除藉由 BITs 維護海外企業的投資安全，大國還別有用心。但可惜的是，Allee and Peinhardt 未對此一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綜合上述，過去文獻有關 BITs 的研究議題主要有三：一是探索 BITs 的具體內容。對此，國際法學者已勾勒出完整的架構。二是檢證 BITs 的成效。即使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迄今仍無法斷定，BITs 是促成 FDI 大幅擴張的原因。第三，後續研究轉向探討 BITs 急遽擴散的原因。國際關係學者認爲，此肇因於投資大國與開發中國家間的權力不平衡。但先行研究沒有詳加論述，大國積極洽簽 BITs 的意圖爲何。爲此，以下將建立四項研究假設，詳細論證大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的政經動機。

## 二、研究假設──大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的動機

權力與偏好研究途徑（power and preferences approach, PPA）立基於國際關係中最核心的概念──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PPA 強調，投資大國的議價權力（bargaining power）愈大，則其愈能夠將偏好反映在 BITs 的內容當中。但如前所述，先行研究只注意到，投資大國可以憑藉權力非對稱的優勢，主導 BITs 的設計，卻沒有進一步分析大國偏好（Allee and Peinhardt, 2010: 1-26；2014: 79）。據此，本文試圖建立四項研究假設，詳加論證大國簽署 BITs 的決定性因素。

首先，開發中國家的投資環境，經常伴隨高度的政治風險，這會削弱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的投資意願。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指出，今後 3 年（2013-2015 年），僅一成左右的 MNEs，願意投資高政治風險國家（MIGA, 2014: 17-18）。因爲 MNEs 相當擔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資產遭到地主國的徵收，或無法將資金移轉出境外，以及受到政治動盪的波及（Hamada et al., 2004: 301-326）。

因此，投資大國可能會透過 BITs 的簽署，保障海外企業的投資安全。例如：Bergstrand and Egger (2013: 107-122) 利用機率單位模型，檢證 2000 年 161 個國家簽署 BITs 的決定性因素。結果顯示，高政治風險國家簽署 BITs 的機率是低政治風險國家的 1.052 倍。但是，Elkins et al. (2006: 837) 與 Swenson (2009: 445-446) 的量化結果顯示，地主國政治風險不是大國簽署 BITs 的考量。此外，如前所述，Allee and Peinhardt (2014: 79) 證實，大國擁有的 MNEs 數量與 BITs 保障強度，兩者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關係（$p$>10%）。據此，我們建立兩項研究假設：

**假設 1：地主國政治風險高低，不會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

**假設 2：投資大國對地主國直接投資的多寡，不會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

該兩項假設以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形式呈現，表示既有文獻對此尚無定論。但這又是眾多學者長期關注的焦點（Simmons, 2014: 12-46；Büthe and Milner, 2008: 741-762；2014: 88-122），因此有必要重新再次檢證。如果無法拒絕上述兩項假設，表示投資大國尋求 BITs 洽簽對象時，不會考量企業海外分布與地主國政治風險。當然，我們不排除，上述兩項假設部分成立的情形，這可能反映出，大國執行差異化的經濟外交戰略。

其次，大國還可能覬覦的是，地主國的區位優勢（Dunning, 1998: 45-66）。例如，Bergstrand and Egger (2013: 107-122) 的實證結果顯示：地主國的市場規模愈大、科技水準愈高，則該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愈高。此外，Neumayer (2006: 245-267) 也證實，投資大國的自身利益會影響其洽簽 BITs 的優先次序。據此，我們建立第三項研究假設：

**假設 3：地主國的區位優勢愈強，則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愈高。**

該項假設著眼於更長遠的國家利益，而非被動地回應企業需求（假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與假設 2）。例如：郭建中、王國臣（2013：97-129）發現，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 OFDI）的目的爲，攫取當地的天然資源與戰略資產，以維繫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所需。

最後，大國間相互競爭也是關鍵因素。因爲 BITs 會產生投資創造（investment creation）與投資移轉（investment diversion）。投資創造是指，BITs 將擴大本國對地主國的直接投資。投資移轉則是指，BITs 將吸引其他大國的 MNEs 轉移到本國生產（童振源，2009：85-86；Motta and Norman, 1996: 757-783；Markusen, 2004: 1-26）。

在實證研究上，Salacuse and Sullivan (2009: 109-170) 證實，當地主國只與美國單一大國簽訂 BIT 時，則美國對該國的直接投資將擴大 1.57 個百分點。不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其他會員國若跟進，則會削弱美國的投資優勢。換言之，大國會預防其他大國從 BITs 獲益過多，拉大彼此間的差距，特別是阻斷投資移轉，因爲這將直接衝擊本國經濟（Destler, 2005: 301）。據此，本文建立第四個研究假設：

**假設 4：地主國與愈多的投資大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則尚未簽訂的投資大國與該地主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機率愈高。**

該項假設表明，競簽 BITs 可消弱對手國的投資創造，並降低投資移轉造成的傷害。若實證結果顯著拒絕該項假設，表示大國的經濟外交行爲都趨同。

綜上所述，目前關於 BITs 的量化研究還很少──只有 22 篇 SSCI 論文，占全部 SSCI 論文總數的兩成不到；其中，實證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更是付之闕如。據此，本文建立上述四項研究假設，詳細論證投資大國洽簽 BITs 的各項決定性因素，並檢證之。以下進一步說明研究方法。

## 參、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追蹤資料邏輯模型（PDLM），分析 1987-2012 年，中國大陸、法國、德國、日本、英國，以及美國等 6 個投資大國，對 102 個開發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s）的政經動機。[1] 以下依序說明：本文的資料分析方法、實證變數，及資料來源。

## 一、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的被解釋變數爲二分變數（dichotomy），即當兩國簽署 BIT 時，編碼爲 1；反之爲 0，應使用二元選擇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不適用線性迴歸模型。二元選擇模型可再區分爲兩個模型：機率單位模型與邏輯模型（logit model）；兩者差別在於：機率單位模型假設，事件的發生機率符合標準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邏輯模型則爲 logistic 分配（Hill et al., 2008: 417-456）。

進一步而言，由於金融資料具有波動群聚（volatility clustering）現象，即大波動通常伴隨大波動，而小波動則緊接著小波動，很難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Engle, 1982: 987-1007）。因此，大多數的研究學者都採用邏輯模型，例如：Berdiev et al. (2012: 38-53)、Hegre et al. (2013: 250-270)、Borooah et al. (2013: 569-584)，以及顏永銘（2013：91-118）。據此，我們建立以下實證模型：

$$BIT_{i,j,t} = c + \sum_{k=1}^{k} \beta_k + X_{k,i,j,t-1}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式中，下標 $i$、$j$ 與 $t$ 分別表示投資大國、地主國與年份。被解釋變項爲兩國有無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c$ 爲截距項，$\varepsilon$ 表示隨機誤差項。$X_k$ 則是影響大國簽署 BITs 的各項因素。同時，我們還使用 White 穩健標準差，保證實證模型的有效性（White, 1980: 817-838）。此外，依據 Abiad et al. (2007: 1-38) 的建議，本文讓解釋變數的期數，比被解釋變數先行一期 ($X_{t-1}$)，避免內生性（endogeneity）問題。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各項實證變數。

[1] 本文綜合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013）、聯合國貿易開發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 2014a），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2013）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定義。經確認，這 102 個國家都屬於開發中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變數說明與資料來源

本文匯整多個資料來源，以期全面性檢視，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以下依序說明：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以及控制變數的操作型定義與資料來源。

### ㈠被解釋變數

本文的被解釋變數爲：各主要投資大國是否與 102 個地主國簽署 BITs。即：

$BIT_{i,j,t}=1$，表示於第 $t$ 年第 $i$ 個投資大國與第 $j$ 個地主國，有簽署 BIT；
$BIT_{i,j,t}=0$，表示於第 $t$ 年第 $i$ 個投資大國與第 $j$ 個地主國，無簽署 BIT；

其中，投資大國是指，該國的 OFDI 與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都位居世界前 10 名之內。我們希望藉此排除不必要的干擾——離岸金融中心作爲投資中轉地，而側重分析實體投資（Zoromé, 2007: 1-34）。

根據表 1 可知：2008-2012 年，美國 OFDI 累計爲 1,628 億美元，占世界 OFDI 總量的比例爲 21.1%，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同時，美國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其 GDP 占世界的比例高達 23.0%。符合上述兩個條件的國家共有 8 個，但可惜的是，俄羅斯與加拿大 2007 年以前的資料不全。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限縮爲 6 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與中國大陸。

還需說明的是，根據 UNCTAD 的定義，BITs 可以分爲兩類：簽署（signature）與生效（entry into force）。參酌 Elkins et al. (2006: 811-846) 的研究方法，我們以簽署日期，作爲 BIT 的代理變數。理由有二：第一，BITs 草案足以反應大國的主觀意志。第二，簽署日期是極重要的事件日，即向國際市場宣告：本國業已取得地主國的投資優惠與保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 主要投資大國的定義（2008-2012 年）**

單位：占世界總量的比例（%）

| 項目類別 | 對外直接投資 | 國內生產毛額 | 研 究 對 象 |
|---|---|---|---|
| 比 利 時 | 4.3 | 0.7 | |
| 巴 西 | 0.2 | 3.1 | |
| 加 拿 大 | 3.4 | 2.5 | ✓ |
| 中國大陸 | 4.5 | 9.4 | ✓ |
| 法 國 | 5.5 | 4.1 | ✓ |
| 德 國 | 5.6 | 5.2 | ✓ |
| 香 港 | 5.2 | 0.4 | |
| 義 大 利 | 2.4 | 3.2 | |
| 日 本 | 6.4 | 8.3 | ✓ |
| 俄 羅 斯 | 3.5 | 2.5 | ✓ |
| 英 國 | 5.2 | 3.7 | ✓ |
| 美 國 | 21.1 | 23.0 | ✓ |

說 明：✓表示，同時符合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毛額，皆位居世界前 10 大的國家。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 ㈡解釋變數

本文解釋變數有六：一是地主國政治風險（PR）。參酌 Ahlquist (2006: 681-704) 與 Choi and Samy (2008: 83-103) 的研究方法，我們選取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II）建構的風險評級，作爲 PR 的替代變項。II 的分數範圍介於 0～100 分，0 分表示：該國政局處於極度動盪的狀態；反之，100 分表示該國政治極爲穩定。根據假設 1 ── 地主國政治風險高低，不會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我們預期，PR 的理論預期方向爲不確定。

二是大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OFDI），即大國對各地主國直接投資占其 OFDI 的總額。根據假設 2 ── 投資大國對地主國直接投資的多寡，不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我們預期：OFDI 的理論預期方向也爲不確定。

第三，依循 Globerman and Shapiro (2003: 19-39)、黃智聰、歐陽宏（2006: 139-178）的研究方法，我們以 GDP 作爲市場規模的替代指標。根據假設 3——地主國的區位優勢愈強，則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愈高；我們預期：GDP 的理論預期方向爲正向。

第四，綜合 Buckley et al. (2007: 499-518)、Kolstad and Wiig (2012: 26-34)、Shepotylo (2012: 327-349)，以及 Anyanwu (2012: 425-462) 的研究，我們以地主國的原油、礦石與金屬出口額的加總，作爲更全面地衡量地主國的天然資源（NRE）。[2] 根據假設 3，我們預期：NRE 的理論預期方向爲正。

第五，由於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只有統計 25 個國家的平均工資，因此我們依據 Li and Resnick (2003: 175-212) 與 Stoian (2013: 615-637) 的研究方法，以地主國每人平均 GDP (GDP per capita, GDPPC)，作爲勞動成本的替代變數。我們預期，基於降低成本的考量，GDPPC 的理論預期方向爲負。[3]

最後，我們建構競爭壓力指數（competitive pressure index, CPI），以測量各投資大國競簽 BITs 的壓力。CPI 爲地主國與其餘 5 個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數量，取值 0～5 分，0 分表示：該地主國都沒有與任何投資大國簽署 BITs。5 分表示：該地主國與其餘五個投資大國都簽署 BITs。根據假設 4——地主國與愈多的投資大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則尚未簽訂的投資大國與該地主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機率愈高，我們預期：CPI 的理論預期方向爲正向。

---

2 Buckley et al. (2007: 499-518) 與 Kolstad and Wiig (2012: 26-34) 採用，地主國礦石與金屬的出口額，而 Shepotylo (2012: 327-349) 與 Anyanwu 則採用原油出口量。這都只能部分反應一國的天然資源。

3 GDPPC 也可解讀爲經濟發展程度，通常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科技水準也較高，愈能夠吸引戰略資產尋求型的 MNEs（黃智聰、歐陽宏，2006：139-178）。但我們將地主國限定在開發中國家，投資大國到此尋求戰略資產的動機，應該很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㈢控制變數

本文的控制變數只有 1 個：投資大國與地主國首都間的飛行地理距離（DIS）。Davidson (1980: 9-22) 指出，兩國間地理距離，可反應兩國文化差異。當地理距離愈近，兩國的文化將具有更多的共通性。據此我們預期，地理距離的理論預期方向爲負向，表示文化差異愈小，兩國簽署 BIT 的機率愈大。茲將所有實證變數的操作型定義與預期影響方向，匯整於表 2。

**表 2 變數說明與預期影響方向**

| 項目類別 | 操作型定義 | 預期影響方向 |
|---|---|---|
| BIT | 各投資大國與地主國簽署 BITs 爲 1；反之爲 0 | n.a |
| PR | 地主國的機構投資者風險評級分數 | ? |
| OFDI | 各投資大國對各地主國直接投資額 / 各投資大國 OFDI 總額 | ? |
| GDP | 各地主國 GDP / 各投資大國 GDP | + |
| NRE | 各地主國天然資源出口額 / 世界天然資源出口額 | + |
| GDPPC | 各地主國每人平均 GDP / 各投資大國每人平均 GDP | – |
| CPI | 地主國與其餘五個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數量 | + |
| DIS | 各投資大國首府到各地主國首府的飛行地理距離 | – |

說明：1.「+」、「–」與「？」分別表示，預期影響方向爲正向、負向與不確定。
2. n.a. 表示，資料無法取得。
3. 天然資源爲各國原油、礦石與金屬出口額。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表 3 爲各實證變數的資料來源。BIT 與取自 UNCTAD (2014b) 建構的雙邊投資協定資料庫（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database, IIA）。其次，GDP、GDPPC 與 NRE 的資料來源爲世界銀行。第三，PR 取自各期的《機構投資者雜誌》。第四，DIS 的資料來源爲：法國國際經濟預測研究中心（The French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CEPII, 2014）。最後，OFDI 的資料來源有二：OECD (2014) 與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實證變數的資料來源**

| 項　目　類　別 | 資　料　來　源 |
|---|---|
| 雙邊投資協定（BIT） | 聯合國貿易開發委員會（UNCTAD） |
| 競爭壓力指數（CPI） | 聯合國貿易開發委員會（UNCTAD） |
| 相對經濟規模（GDP） | 世界銀行（World Bank） |
| 地主國天然資源出口比例（NRE） | 世界銀行（World Bank） |
| 相對勞動成本（GDPPC） | 世界銀行（World Bank） |
| 相對地理距離（DIS） | 法國國際經濟預測研究中心（CEPII） |
| 地主國政治風險（PR） | 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
| 投資大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OFDI） |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中國國家統計局 |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此外，參考 Chinn and Frankel (2008: 49-73) 的研究方法，我們對 GDP、NRE、GDPPC、DIS 與 PR 取自然對數（logarithms），以增進模型的估計效率。[4] 同時，我們對每個實證變數，進行標準分數（standard score）的轉換，使每個實證變數的分數尺度都相同，以利後續的勝算比（odds ratio）之比較（Kaufman, 1996: 90-109）。標準分數的轉換公式如下：

$$Z_{k,i,j,t} = \frac{X_{k,i,j,t} - \overline{X}_k}{\sigma_k} \tag{2}$$

式 (2) 中，$X_{kijt}$ 表示：第 $k$ 個變數中，第 $i$ 投資國對第 $j$ 個地主國於第 $t$ 年的觀察值；$\overline{X}_k$ 與 $\sigma_k$ 分別表示：第 $k$ 個變數的算數平均數與標準差；$Z_{kijt}$ 則爲標準化後的觀察值。

綜上所述，本文採用 PDLM，檢證 1987-2012 年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總樣本數高達 15,912 筆觀察值（6個投資大國×102個地主國×26 年）。時間起自 1987 年，是因爲 OECD 於該年起才完整公布，德國、

4　若發生數據爲零的情況，將無法進行自然對數轉換。對此，我們將該筆數值編碼爲 0.0000001（Chinn and Frankel, 2008: 49-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國、日本、英國與美國對世界各國 OFDI 的詳細數據。儘管資料蒐集過程相當費時，但我們盡可能地提高投資大國的涵蓋範圍比例，希望實證結果更貼近事實。以下將進一步說明實證分析的結果。

# 肆、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利用追蹤資料邏輯模型（PDLM），檢證 1987-2012 年 6 個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決定性因素。以下首先進行各項模型穩健性（robustness）檢定，其次再分析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

## 一、模型穩健性分析

首先，我們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核被解釋變數與解釋變數間的關聯。結果顯示，競簽 BITs 的壓力不同（CPI）、地理距離（LDIS）、市場規模（LGDP）、勞動成本（LGDPPC）、天然資源（LNER）、大國的投資分布（LOFDI），以及政治風險（LPR），都會造成大國選擇 BITs 簽署對象的差異（$p$<1%）。此外，所有變數皆顯著拒絕，常態分配檢定的虛無假設（$p$<1%）。這表示：採取 PDLM 有其必要性（Jarque and Bera, 1980: 255-259）（見表 4）。

**表 4　取對數後的各實證變數之基本統計量**

N=15,912

| 項目類別 | 平均數 | 標準差 | 獨立樣本 t 檢定 | 常態分配檢定 |
|---|---|---|---|---|
| CPI | 1.892 | 1.508 | 29.669*** | 953.360*** |
| LDIS | 3.873 | 0.244 | 88.573*** | 4085.437*** |
| LGDP | -0.498 | 0.917 | 106.613*** | 45.923*** |
| LGDPPC | 0.778 | 0.734 | 95.339*** | 2015.347*** |
| LNRE | -2.527 | 2.423 | 116.539*** | 4788.033*** |
| LOFDI | -5.205 | 2.718 | 1942.398*** | 2780.780*** |
| LPR | 1.273 | 0.511 | 125.322*** | 15788895*** |

說明：1. CPI=競爭壓力指數；DIS=相對地理距離；GDP=相對市場規模；GDPPC=相對勞動成本；NRE=地主國天然資源出口比例；OFDI=投資大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PR=地主國政治風險；L=取自然對數；N=樣本數。

2. ***表示在 α=1%，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次，我們依循 Swenson (2009: 445-446) 的研究方法，加入區域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s），控制橫斷面資料差異過大的問題。[5] 聯合檢定結果顯示，*F* 統計量爲 6.867，達到 1% 的顯著水準，表示加入區域虛擬變數有其必要性。準此，我們再加入投資大國虛擬變數，結果顯示，*F* 統計量爲 530.140，也達到 1% 的顯著水準，表示也需進一步考量，個別投資大國的差異性。

第三，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平均值爲 1.418，遠均低於 10 的臨界值，表示解釋變數間沒有嚴重的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問題（Fox and Monette, 1992: 178-183）。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PDLM 是依據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而非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所以無須符合殘差序列無自我相關（non-autocorrelation）、同質變異（homoskedasticity），以及常態分配的假設。很顯然，PDLM 的假定相對寬鬆（Peng et al., 2002: 3-14）。因此，參酌 Warner (2008: 971-972) 的建議，本文再進行以下兩個檢定：

一是模型解釋力檢定。結果顯示，本文的 McFadden $R^2$ 爲 0.385，明顯高於 Bergstrand and Egger (2013: 107-122)。特別是，樣本內預測準確度高達 80.1%，表示本模型具有相當高的解釋能力。[6] 究其原因，我們的研究對象限定在投資大國，而 Bergstrand and Egger 則含括資本輸出國與輸入國。換言之，區分投資大國與地主國簽署 BITs 的動機，具有理論與實證上的必要性。

二是模型配適度檢定。結果顯示，Hosmer and Lemeshow (1982: 92-106) 統計量爲 4.144，無法拒絕「整體模型配適度良好」的虛無假設（$p$>10%）。此外，概似比值（likelihood ratio）爲 7507.432，達到 1% 的顯著水準，表示採取邏輯模型有其必要性（Hausman and McFadden, 1984: 1219-1240）。很顯然，本文建構的實證模型具有極佳的配適度。透過上述統計檢定，本

5 依據聯合國（United Nations, 2013）的分類標準，我們將各地主國的所在區域劃分爲五，分別是非洲、亞洲、中東南歐、中南美洲，以及大洋洲，並以大洋洲作爲參照組。

6 預測準確度包含兩種情形：一是預測沒有發生，且確實兩國沒有簽署 BITs；二是預測發生，且確實兩國已經簽署 BITs。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建構的實證模型並無發現重大的計量瑕疵，詳細資料匯整於表 5。

**表 5 模型穩健性檢定**

| 項目類別 | 統計量 | 判斷準則 |
|---|---|---|
| 區域效應 | 6.867(4, 14467)*** | $P < 10\%$ |
| 投資大國效應 | 6.867(5, 14467)*** | $P < 10\%$ |
| 變異數膨脹因子 | 1.418 | VIF < 10 |
| McFadden $R^2$ | 0.385 | n. a. |
| 樣本內預測準確度 | 80.1% | n. a. |
| Hosmer-Lemeshow | 4.144 | $p > 10\%$ |
| 概似比值 | 7507.432*** | $P < 10\%$ |

說明：1.因爲解釋變數的期數，比被解釋變數先行一期，因此樣本數減少爲 14,484 筆觀察值。
2. 括弧內數字表示自由度。
3. 區域虛擬變數有四：亞洲、非洲、中南美洲與歐洲，並以大洋洲爲參照組（等於零）。
4. 投資大國虛擬變數有五：中國大陸、德國、法國、美國與日本，並以英國爲參照組（等於零）。
5. *** 表示，在 α=1% 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
6. n.a. 表示資料無法取得。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此外，我們也非常關心，本文建構的實證模型之實用性。因此，我們以 1997-2012 年 15 個共產轉型國家，[7] 進行樣本外預測。表 6 顯示，預測兩國將簽署 BIT，但實際上沒有簽署（型 I 誤差）的案例數爲 113 筆，預測兩國不會簽署 BIT，但實際上確有簽署（型 II 誤差）的案例數，共 96 筆，兩者合計占全部樣本數的比例爲 14.5%。換言之，樣本外預測準確度高達 85.5%，比樣本內準確度還要高出 5.4 個百分點，表示本文建構的實證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據此，以下進一步說明實證分析的結果。

7 共產轉型國家包括亞美尼亞、亞塞拜然、白俄羅斯、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喬治亞、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馬其頓、摩爾多瓦、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塔吉克、土庫曼、烏克蘭，以及烏茲別克。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樣本外預測準確度檢定**

單位：個

| 項　目　類　別 | 實際沒有簽署（水準值=0） | 實際有簽署（水準值=1） |
|---|---|---|
| 預測沒有簽署（機率值≤0.5） | 418 | 96 |
| 預測有簽署（機率值>0.5） | 113 | 813 |
| 合　　計 | 531 | 909 |

說明：觀察值爲 1,440 筆（6 個投資大國×15 個地主國×16 年）。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 一、大國簽署雙邊投資協定的原因分析

表 7 爲各實證變數對大國簽署 *BITs* 的影響。首先，LPR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1%)，表示政治風險愈低的地主國與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政治風險愈高的地主國之 1.395 倍，即兩者的勝算比爲 1.395 倍。實證結果拒絕假設 1 ── 地主國政治風險高低，不會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究其原因，BITs 的執行仍有賴良善治理的國家，因此大國選擇 BITs 夥伴，會優先考量政治風險相對較低的開發中國家。

其次，LOFDI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1%)。這表示：接受 OFDI 愈多的地主國與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接受較少 OFDI 的地主國之 1.111 倍。實證結果拒絕假設 2 ── 投資大國對地主國直接投資的多寡，不會影響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換言之，海外企業的投資安全也是，大國簽署 BITs 的考量因素之一。

第三，*LGDP*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1%)，表示市場規模較大的地主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市場規模較少的地主國之 1.225 倍。LNER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5%)，表示天然資源較豐富的地主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天然資源較稀缺的地主國之 1.048 倍。LGDPPC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負（$p$<1%），表示工資成本較高的地主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工資較低的地主國之 0.825 倍，意即大國傾向與工資較低的國家簽署 BITs。

我們進一步檢證地主國區位優勢的綜合效果(LAC)。實證步驟上，本文先對 LGDP、LNER 與 LGDPPC 的係數取絕對值，再進行係數和檢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果顯示，LAC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10%)，表示區位優勢較強的地主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區位優勢較弱的地主國之 1.556 倍。換言之，實證結果支持假設3 ── 地主國的區位優勢愈強，則投資大國與該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發生機率愈高。

第四，CPI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正($p$<1%)，表示地主國與愈多的大國簽署 BITs 時，則尚未簽訂的大國將跟進的機率是，維持現狀的 3.665 倍。換言之，實證結果支持假設4 ── 地主國與愈多的投資大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則尚未簽訂的投資大國與該地主國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機率愈高。

第五，LDIS 的迴歸係數顯著爲負($p$<1%)，表示：距離投資大國愈遠的地主國簽署 BITs 的機率是，距離大國愈近的地主國之 0.678 倍，意即大國傾向與距離較近的國家簽署 BITs。換言之，實證結果與理論預期方向一致。

最後，我們依據 Warner (2008: 971-972) 的建議，以 Wald 檢定進行雙重驗證。檢定結果顯示，所有實證變數的卡方（chi-square）統計量，都達到 5% 的顯著水準，再次證明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極佳的穩健性。

**表 7　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

| 項目類別 | 迴歸係數 | Wald 檢定 | 勝算比 |
|---|---|---|---|
| LPR(-1) | 0.333 (0.110)*** | 9.095*** | 1.395 |
| LOFDI(-1) | 0.106 (0.026)*** | 16.210*** | 1.111 |
| LAC | 0.442 (0.068)*** | 42.848*** | 1.556 |
| LGDP(-1) | 0.203 (0.039)*** | 26.879*** | 1.225 |
| LNRE(-1) | 0.047 (0.023)** | 4.025** | 1.048 |
| LGDPPC(-1) | -0.192 (0.052)*** | 13.671*** | 0.825 |
| CPI(-1) | 1.299 (0.036)*** | 1269.622*** | 3.665 |
| LDIS | -0.388 (0.028)*** | 189.783*** | 0.678 |
| C | -0.200 (0.119)* | 2.839* | 0.819 |

說明：1.被解釋變項爲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BIT），資料處理方法爲追蹤資料邏輯模型（PDLM）。同時，加入各投資大國與區域虛擬變數。

2. CPI=競爭壓力指數；DIS=相對地理距離；LAC=地主國區位優勢綜合效果；GDP=相對市場規模；GDPPC=相對勞動成本；NRE=地主國天然資源出口比例；OFDI=投資大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PR=地主國政治風險；C=截距項；L=取自然對數；N=樣本數。

3. ***、**、* 分別表示，在 α=1%、5%、10% 的顯著水準下，以雙尾檢定。

4. 括弧內數字表示迴歸標準誤。

5. (-1) 表示解釋變數的期數，比被解釋變數先行一期，因此樣本數減少爲 14,484 個。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顯然，競爭壓力是投資大國簽署 BITs 最關鍵的因素。然而，CPI 是否僅單純反應各大國簽署 BITs 的數量而已？即簽署 BITs 愈多的國家，其競爭壓力愈小？相對而言，簽署 BITs 愈多的國家，其構成其他大國的競爭壓力愈大？果眞如此，將大幅削弱本文的研究貢獻。

因此，我們額外進行兩項敏感性分析：第一，檢定各大國 BITs 簽署數量與 CPI 的相關性；其中，個別國家 CPI 的估計方程式爲：

$$BIT_{j,t} = c + \beta_h CPI_{h,j,t-1} + \sum_{k=1}^{k} \beta_k X_{k,j,t-1} + \varepsilon_{j,t} \quad (3)$$

式中，下標 $j$ 與 $t$ 分別表示地主國與年份。被解釋變項爲 6 個大國有無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c$ 爲截距項，$\varepsilon$ 表示隨機誤差項。CPI 則爲競爭壓力指數，$X_k$ 是其餘影響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因素。換言之，我們以 6 個迴歸式，個別估計中國大陸、德國、法國、日本、英國，以及美國的 CPI。

結果顯示，各大國 *BITs* 簽署數量與 CPI，兩者的相關係數爲 -0.475，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10%）。這表示：簽署 BITs 愈多的國家，其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未因此減輕，例如：德國簽署 BITs 的數量最多（134 個），但其感受到的競爭壓力爲 2.397，僅次於日本。反之，美國簽署 BITs 的數量只有 46 個，但其感受到的競爭壓力卻相對較輕，在 6 個投資大國中排名倒數第二。

第二，檢定各大國 BITs 簽署數量與 CPI 主要來源國（CPIC）的相關性；其中，個別國家 CPIC 的估計方程式爲：

$$BIT_{i-m,j,t} = c + \beta_h BIT_{m,j,t-1} + \sum_{k=1}^{k} \beta_k X_{k,i-m,j,t-1} + \varepsilon_{i-m,j,t} \quad (4)$$

式中，下標 $i$、$m$、$j$ 與 $t$ 分別表示投資大國、特定的單一投資大國、地主國與年份。被解釋變項爲兩國有無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c$ 爲截距項，$\varepsilon$ 表示隨機誤差項。$BIT_m$ 爲特定的單一大國簽署 BITs 的國家分布，$X_k$ 則是其餘影響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因素。換言之，我們以 6 個迴歸式，個別估計中國大陸、德國、法國、日本、英國，以及美國 BITs 的國家分布，對其他 5 個大國簽署 BITs ($BIT_{i-m}$) 的影響，即等於 CPIC。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果顯示，各大國 BITs 簽署數量與 CPIC，兩者的相關係數爲 0.600，同樣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這表示：BITs 的簽署數量，不是構成投資大國競爭壓力的主要來源。例如：美國簽署 BITs 的數量遠不及中國大陸的 130 個、法國的 103 個，但各國皆明顯感受到美國的威脅（1.297），高於中國大陸（1.243）與法國（1.280）（見表 8）。

**表 8　雙邊投資協定簽署數量與競爭壓力**

| 項目類別 | BITs 簽署數量（個） | 本國感受到的 CPI | CPI 來源國 |
|---|---|---|---|
| 中國大陸 | 130 | 1.132*** | 1.243*** |
| 德　國 | 134 | 2.397*** | 1.344*** |
| 法　國 | 103 | 1.413*** | 1.280*** |
| 英　國 | 105 | 1.486*** | 1.390*** |
| 日　本 | 22 | 2.894*** | 1.134*** |
| 美　國 | 46 | 1.557*** | 1.297*** |

說明：1. BIT＝雙邊投資協定；CPI＝競爭壓力指數。
2. *** 表示，在 1% 的顯著水準下顯著（以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投資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依序爲：競爭壓力、覬覦地主國的經濟資源，以及保障海外直接投資的安全。此外，大國也很在意地主國的政治風險。這是過去文獻忽略之處──政治壓力大於經濟利益。特別是，BITs 簽署數量並非主要的壓力來源，表示還存在重要但無法透過量化檢證的關鍵因素。爲此，本文以下將援引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以中美兩大國爲個案，分析投資大國競簽 BITs 的質化因素──壓力來源與調適策略。

## 伍、國際體系下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模式

新古典現實主義論者強調，外交政策爲國際體系權力結構、決策者與國內政治交互作用的產物。由此觀之，投資大國競簽 BITs 的壓力來源爲：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而認知差異將影響調適策略的選擇。以下將依循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探討主要投資大國各自的競簽壓力來源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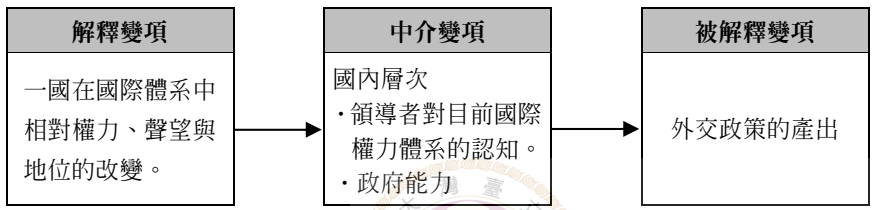
因應策略。但是，在有限的篇幅及語言障礙的限制下，本文只以中美兩大國作爲個案，德國、法國、英國與日本等 4 國競簽 BITs 的原因，則建議後續研究可採用相同的分析架構，予以論證。[8]

##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架構

新古典現實主義發端於 1990 年代初期，至 2000 年已獲得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高度重視。其理論主張有三：第一，各國設法在無政府（anarchy）的不確定狀態下，極大化國家利益與國際影響力，以形塑有利於己的國際環境。第二，決策者對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是決定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第三，國家權力能否轉化爲國際行動力量，還需取決於政府能力（state power）。例如：以國家權力而言，於 19 世紀後期，美國已擠進世界強權的行列當中，但直到 20 世紀初，隨著政府能力的提升，美國方得以發揮國際影響力（Rose, 1998: 144-172；鄭端耀，2005：115-140）。易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在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基礎上──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與國家外交行爲，再加入決策者的認知與政府能力兩個變數，讓國際關係理論更貼近外交實務。

圖 2 進一步說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解釋變項爲相對的國際權力、聲望與地位。中介變項爲國內政治因素，包括領導者對目前國際體系的認知、政府對外交政策的執行能力。被解釋變項爲外交政策的產出。準此，我們以下將依據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認知、政府能力，以及經濟外交政策的內涵三個面向，分析中美兩大國簽署 BIT 的壓力來源與調適策略。

**圖 2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Rose (1998: 144-172)；Zakaria (1998)；Taliaferro (2004: 41)

[8] 本文非常感謝 3 位匿名審查人有關國際關係理論應用的建議。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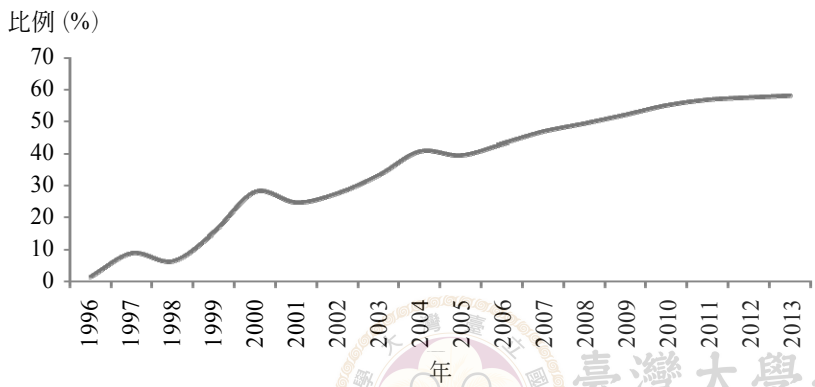
## 一、中國大陸走出去戰略

在既存的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架構下，中國大陸競簽 BITs 的壓力來源爲：維繫內部能源供應安全。因此，中國大陸政府試圖透過企業走出去戰略，確保海外能源供給穩定。

進一步而言，在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認知方面，北京當局認爲，冷戰後的國際經濟體系日趨多極化，但美國仍掌控一定程度的主導權。例如：在中國共產黨第 15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1997）闡明：全球政治經濟領域呈現多極化趨勢，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損害著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更進一步表示：中國大陸遭遇麻六甲困境（Malacca Dilemma），即近九成的海外石油，都必須仰賴這條由美國控制的航道（石洪濤，2004）。

特別是如圖 3 所示，中國大陸原油對外依存度，從 1996 年的 1.6% 飆高到 2013 年的 58.1%。中國大陸已超越美國，躍升爲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EIA, 2014）。國際能源總屬（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IEA, 2014）預計，中國大陸將於 2030 年再擠下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對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強調，能源供需失衡已嚴重威脅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前景。

**圖 3　中國大陸原油對外依存度（1996-2013 年）**




說明：原油對外依存度的計算公式爲：原油進口量減去出口量，再除以原油消費量。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尋找 BITs 夥伴，主要以能源安全爲重。例如，自 2004 年起，中國大陸政府密集頒布三次的《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鼓勵境內企業走出去，投資 44 個國家的能源產業──石油、天然氣、煤礦與油頁岩，其中高達 37 個國家，都是中國大陸的 BITs 締結國。很顯然，中國大陸利用經濟外交（BITs）爲工具，目的之一是塑造有利於其經濟發展的環境，並確保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關鍵資源不會中斷，進而追求國際影響力（鄭端耀，2005：125）（見表 9）。

**表 9　中國大陸鼓勵對石油產國直接投資與簽訂雙邊投資協定**

| BITs 簽訂時間 | 產　　油　　國　　家 |
|---|---|
| 1980-1989 年 | 挪威、科威特、澳大利亞、巴基斯坦 |
| 1990-1999 年 | 巴布亞紐幾內亞、蒙古、烏茲別克、玻利維亞、哈薩克、烏克蘭、土庫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亞塞拜然、厄瓜多、埃及、印尼、阿曼、摩洛哥、古巴、沙烏地阿拉伯、孟加拉、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加蓬、蘇丹、葉門、卡達 |
| 2000-2014 年 | 剛果、伊朗、奈及利亞、緬甸、千里達和多巴哥、哥倫比亞、印度、利比亞、加拿大 |
| 尚未簽屬 | 汶萊、東帝汶、巴西、委內瑞拉、蘇利南、安哥拉、尼日 |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2004; 2005; 2007）；UNCTAD (2014b)

其次，在政府能力方面，中國大陸盡可能地整合所有資源，促成 BITs 的簽署。例如：2008 年，在中國大陸──哥倫比亞 BIT 的簽字儀式上，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明，將擴大對哥倫比亞的外援（foreign aid）（齊彬，2008）。整個來看，2002-2013 年，中國大陸的 BITs 夥伴，共接受 4,442 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外援，[9] 占全部外援總額的比例高達 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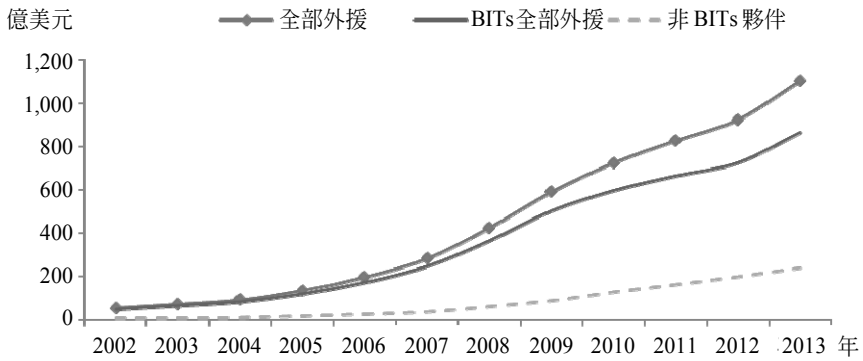
此外，中國大陸也將部分外援，挪用到極欲建成 BITs 夥伴關係的產油國家之上。例如：2002-2013 年，安哥拉共接收中國大陸 370 億美元的外

9　截至目前爲止，中國大陸政府尚未完整公布，詳細的外援對象與金額。不過，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可知，成套項目──對外承包工程，爲外援最大宗項目，比例高達 58.6%。世界銀行也是以此衡量中國大陸外援。請參見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Zafar (2007: 103-130)。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援，居中國大陸第二大援助國，僅次於印度。在經過十多年的經濟交往後，2014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向安哥拉總統 Jose Eduardo Dos Santos 提出，雙方盡快簽訂 BIT 的訴求（郝亞琳、常愛玲，2014）。由於中國大陸外援不附帶政治改革條件，從而贏得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好感（Lampton, 2008）（見圖 4）。

**圖 4　中國大陸外援與雙邊投資協定（2002-2013 年）**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2014）

最後，就經濟外交政策的內涵而言，中國大陸走出去戰略展現相當程度的彈性。如表 10 所示，中美 BIT 存在顯著差異：第一，中國大陸沒有採取制式範本，而是針對不同國家採逐一商討協定內容，給予開發中國家更大的參與空間。第二，中國大陸 BITs 對於投資的定義、投資優惠的適用範圍、徵用賠償與資金移轉，都較美國更寬鬆。第三，中國大陸沒有規定投資透明度、公營事業應恪守競爭中立（competition neutrality）原則，以及實績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條款。[10] 第四，中國大陸 BITs 強調，MNEs 應當用盡地主國的所有救濟措施，且在兩國政府外交斡旋失敗

[10] 實績要求條款是指，地主國政府對 MNEs 強加承諾。以 2012 年美國 BITs 範本爲例，這涉及以下六個方面：第一，出口需達到特定水準；第二，產品需達到特定水準的國內含量；第三，內銷產品應給予優惠；第四，限制內銷產品的數量與範圍；第五，需向本土企業轉讓技術與關鍵知識；第六，禁止購買本土特定技術。請參見 USTR (2012b)。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方能將投資爭端提交國際仲裁。換言之，中國大陸希望藉此表達，尊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主權，以求互利雙贏。

**表 10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差異**

| 項目類別 | 中　國　大　陸 | 美　　國 |
|---|---|---|
| 協定形式 | 簡式範本 | 制式範本 |
| 締約目的 | 尊重雙方經濟主權 | 經濟開放與企業社會責任 |
| 投資定義 | 依照地主國法律 | 依照美國法律 |
| 投資優惠 | 准入後階段 | 擴及准入前階段 |
| 徵收補償 | 適當 | 充分、即時與有效 |
| 資金移轉 | 可採取臨時性管制措施 | 不得遲延資金的匯出與匯入 |
| 實績要求 | 未規定 | 全面性 |
| 投資環境 | 未規定 | 要求透明度與競爭中立 |
| 投資仲裁 | 應當用盡當地救濟 | 得逕行直接仲裁 |
| 爭端解決 | 六個月的國家間外交解決爭端期限 | 未規定 |

資料來源：USTR (2012b)、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2013）

## 一、美國競爭性自由化戰略

美國競簽 BITs 的壓力來源爲：在既存的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架構下，擔心國際經濟霸權地位的動搖。因此，華府擬定競爭性自由化（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戰略，旨在強化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進一步而言，在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認知方面，儘管在 IMF 與世界銀行中，美國仍擁有「一票否決」的特權。但華府已意識到，當今的國際經濟體系已轉變爲多極並存。如果沒有其他強國的支持，美國很難遂行其意志（Nye, 2003: 60-73）。特別是，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還沒有出現類似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國際建制（regime），因此美國亟欲爭奪 BITs 的議題設定權力。

最明顯的例證是，2012 年，美國與歐盟達成《國際投資共同原則》（*Shared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如表 11 所示，這 7 項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原則，早已反映在 2004 年的美國 BITs 範本（BITs model），但歐盟國家則未對 BITs 進行如此詳盡的規定。這顯示，美國企圖以更高規格的 BITs 標準，凌駕在歐盟之上，將美國的商業法規進一步推向世界。很顯然，美國的國家利益爲，營造更開放、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體制，進而維繫美國的國際影響力（Gilpin, 2002: 237-248）。

**表 11　歐美雙邊投資協定內容的比較**

| 項　目　類　別 | 美國 | 德國 | 法國 | 英國 |
|---|---|---|---|---|
| 促進開放與非歧視的投資環境 | ✓ | ✓ | ✓ | ✓ |
| 營造公平競爭的場域 | ✓ | | | |
| 提供跨國投資強而有力的保護措施 | ✓ | ✓ | ✓ | ✓ |
| 強化透明度與公眾參與之規定 | ✓ | | | |
| 建立公平且有約束力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 | ✓ | ✓ | ✓ | ✓ |
| 敦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 ✓ | | | |
| 狹義定義國家安全審查規則 | ✓ | | | |

說明：美國、德國與英國的 BITs 範本爲 2008 年，法國爲 2006 年。
資料來源：UNCTAD (2014b), USTR (2012a)

不僅如此，美國憑藉龐大的政府能力，施壓開發中國家簽署 BITs (Bergsten, 2002: 86-98)。如表 12 所示，2013 年，共有 36 個開發中國家與美簽署 BITs；其中，對美經濟依賴最高的前 25%，其對美貿易經濟依存度——雙邊貿易額占這些國家 GDP 的比例，高達 11.373%。相對而言，美國對這些國家的貿易經濟依存度只爲 0.045%，兩者比值高達 252.0 倍。即使經濟依賴最低的 25%，該比值仍維持在 6.3 倍。這表示：這些開發中國家對美的經濟依賴，遠大於美國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需求。

迫於經濟權力差距懸殊，開發中國家只能全盤接受，美國預先擬定的 BITs 範本。因爲根據過去的經驗顯示，沒有認眞執行 BITs 且與美國關係交惡的國家，將會被縮減該國進口到美國的額度（Evenett and Meier, 2008: 31-66）。如圖 5 所示，馬來西亞迄今還沒有與美國建立 BIT 夥伴關係。因此，美國自馬來西亞進口的比例，從 2000 年（競爭性自由化戰略實施前）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 7.7%，衰退到 2013 年的 4.1%，共衰退 3.6 個百分點，居 135 個開發中國家之冠。換言之，美國政府將內需市場，轉化成爲權力應用的工具，藉此影響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而維持其霸權力量。

**表 12　美國與開發中國家雙邊投資協定夥伴的貿易經濟依存度（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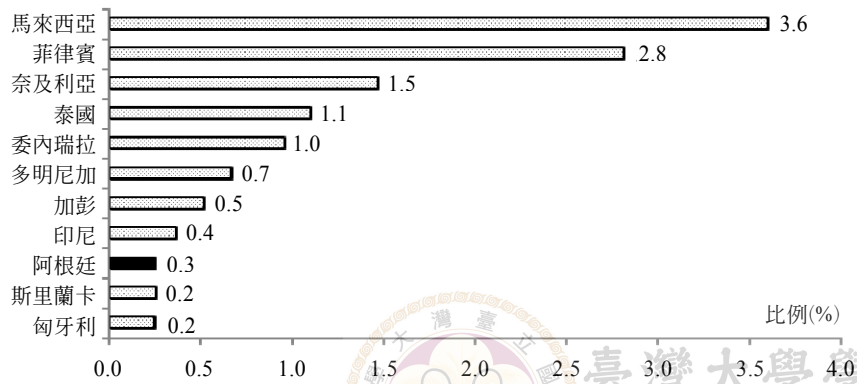
單位：比例(%)、倍

| 項目類別 | BITs 夥伴對美依存度 (a) | 美國對 BITs 夥伴依存度 (b) | 比　　值 (a/b) |
|---|---|---|---|
| 最高的25% | 11.373 | 0.045 | 252.0 |
| 次高的25% | 13.591 | 0.130 | 104.6 |
| 次低的25% | 4.871 | 0.129 | 37.8 |
| 最低的25% | 2.945 | 0.466 | 6.3 |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最後，就經濟外交政策的內涵而言，相較於中國大陸走出去戰略，美國的競爭性自由化戰略較爲制式與僵化。如前表 10 所述，美國企圖建立一致性、更開放、更自由化與更高規格的 BITs 標準，以達到引領國際投資規則制定的制高點。

**圖 5　對美國出口衰退前 10 大開發中國家（2000-2013 年）**




說明：實心條柱表示：該國與美國有簽署雙邊投資協定。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決策者對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是投資大國競簽 BITs 的主因。例如：中國大陸擔心 BITs 產生的投資移轉，中斷其海外能源供給。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即使中國大陸簽署 BITs 的數量，高居世界第二，但其競簽壓力並未減輕。反之，美國簽署 BITs 的目的在於，掌握下一階段國際經濟議題——跨國投資自由化的設定權力。所以，華府不急於擴張 BITs 的數量，而是確保每一個新簽訂的 BIT，都能充分體現美國價值。

此外，政府能力的差異，也是影響 BITs 模式的關鍵因素。例如：受惠於黨國體制的特殊性，中國大陸政府可以針對個別國家，逐一協商 BIT 內容。換言之，中國大陸走出去戰略相當彈性，其政府有相當大的權力空間。特別是，中國大陸還可以動用龐大的經濟資源，增加談判籌碼。反之，美國則受制於國會約束——《快速授權法》（*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規定的談判期限。因此，美國競爭性自由化戰略較制式與僵化，具體表現在事先擬定好且國會通過的 BIT 範本，再加上財政經費的動支，也需朝野折衝。所以，美國政府傾向以非關稅壁壘的方式，施壓開發中國家讓步。

## 陸、結論

本文利用追蹤資料邏輯模型（PDLM），檢證投資大國對 102 個開發中國家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s）的政經動機。研究對象包括：中國大陸、法國、德國、日本、英國，以及美國等 6 個大國；研究時間為 1987-2012 年，研究樣本數為 15,912 筆觀察值——為歷年研究 BITs 相關議題之最。我們盡可能提高投資大國的涵蓋範圍，並進行多個穩健性檢定，以期讓實證結果更貼近國際現勢。首先，我們總結整理本文的研究發現與過去文獻的異同於表 13。

其次，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五：第一，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動機依序是，競爭壓力、覬覦地主國的經濟資源，以及保障海外直接投資（OFDI）的安全。此外，大國也很在意地主國的政治風險。很顯然，大國簽署 BITs 的首要考量為政治壓力，其次才是經濟利益；這是過去文獻忽略之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13　本文與既有文獻研究結果的比較**

| 變　數 | 既有文獻 | 本　文 | 說　明 |
|---|---|---|---|
| PR | 結果分歧 | 顯著爲正 | 政治風險包含徵用、移轉與政治暴力風險。過去文獻採用的替代變數（如徵用風險），都只是政治風險的部分意涵而已。反之，本文採用機構投資者（II），較能全面性衡量政治風險。 |
| OFDI | 不顯著 | 顯著爲正 | Allee and Peinhardt (2014) 採用的是 MNE 數量。實際投資金額（OFDI）較適合，因爲優先與接受 OFDI 最多的地主國簽署 BITs，可迅速提高海外投資政治風險的保障覆蓋率。 |
| GDP | 顯著爲正 | 顯著爲正 | |
| NRE | NIL | 顯著爲正 | 過去僅存在於質化探討，本文具體量化其對簽署 BITs 的影響。 |
| GDPPC | NIL | 顯著爲負 | 過去僅存在於質化探討，本文具體量化其對簽署 BITs 的影響。 |
| CPI | NIL | 顯著爲正 | 過去僅存在於質化探討，本文具體量化其對簽署 BITs 的影響。 |
| DIS | 顯著爲負 | 顯著爲負 | |

說明：CPI=競爭壓力指數；DIS=相對地理距離；GDP=相對市場規模；GDPPC=相對勞動成本；NRE=地主國天然資源出口比例；OFDI=投資大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PR=地主國政治風險；NIL=過去無相關量化研究。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第二，數量不是構成大國競簽 BITs 的壓力來源，即簽署 BITs 愈多的大國，其競爭壓力未必因此減輕，且不見得就會加重其他大國的競簽壓力。大國對於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認知，才是競爭壓力的主因。例如：即使中國大陸簽署的 BITs 數量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德國。但其競簽壓力依舊沈重，因爲北京當局面對的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問題──確保自身的能源供給安全。相對而言，美國簽署 BITs 的數量雖少，但其競簽壓力並未因此增加。究其原因，美國旨在爲下一階段的國際經濟影響力鋪排──跨國投資的議題設定權力。

第三，政府能力也會影響 BITs 模式。例如：中國大陸政府可以針對個別國家，逐一協商 BIT 內容。特別是，中國大陸還動用龐大的經濟資源，增加談判籌碼。換言之，中國大陸政府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空間。反之，美國 BITs 談判則需國會授權與監督，再加上財政經費的動支，也需朝野折

國立政治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衝。因此，美國競爭性自由化戰略較制式與僵化。影響所及，美國政府傾向以非關稅壁壘的方式，施壓開發中國家讓步。

第四，大國尋求 BITs 洽簽對象，考量的是 OFDI 的分布，而非自身擁有的跨國企業數量（MNEs）（Allee and Peinhardt, 2010: 1-26；2014: 47-87）。因爲優先與接受 OFDI 最多的地主國簽署 BITs，可迅速提高海外投資政治風險的保障覆蓋率。此外，Allee and Peinhardt 也忽略，擴大海外市場、攫取天然資源，以及降低生產成本，都是大國簽署 BITs 相當重要的經濟考量。這表示：大國簽訂 BITs 不只是被動回應 MNEs 的要求，更蘊含長遠的國家利益。

第五，大國選擇 BITs 夥伴的優先考量爲：治理品質較佳的開發中國家。本文的實證結果拒絕自縛雙手（hands tying）的假設——政治風險愈高的國家，其愈積極簽署 BITs。因爲這些國家希望藉此降低 MNEs 的疑慮（Elkins et al., 2006: 811-846）。究其原因，先行研究忽略，處於極端不穩定的國家，可能已疲於應付內部層出不窮的政治動盪，根本無力信守承諾（credit commitment）。因此針對這類國家，大國更傾向擴大外援，加強雙邊政治友好關係（Kimura and Todo, 2010: 482-497），而非憑藉 BITs，維護其企業在當地的投資安全。

本文的學術貢獻有三：第一，全面性檢證大國簽署 BITs 的各項政經動機。*World Politics* (WPO) 指出，投資大國憑藉權力不對稱，施壓開發中國家簽署 BITs，這是 BITs 迅速擴散的主要原因。但 WPO 卻未加說明大國偏好，並忽略大國間的相互競爭。據此，本文的研究發現可進一步充實，權力與偏好研究途徑（PPA）的內涵。

第二，本文的資料分析方法改採 PDLM。該模型具有兩項優點：一是將時間因素納入考量。先行研究大多使用橫斷面（cross section）分析，例如：比例風險模型（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Elkins et al., 2006: 811-846；Neumayer, 2006: 245-267），這不僅忽略變數間的時間遞延（time lag）效果，還可能引發內生性問題。二是金融資料無法服從標準常態分配，因此如果採用機率單位模型（probit model），將削弱實證結果的估計效率，此爲 Allee and Peinhardt (2010: 1-26；2014: 47-87) 與 Bergstrand and Egger (2013: 107-122) 忽略之處。換言之，利用 PDLM 分析大國簽署 BITs 的政經因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有研究方法上的改良意義。

第三，援引新古典現實主義，解釋大國間的經濟外交。過去文獻有以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與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檢視國家安全等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問題。例如：鄭端耀（2003：1-37）、張廖年仲（2005：185-222）、Shambaugh (2005: 1-20)、張登及（2013：53-98），以及唐欣偉（2013：47-70）。相對而言，本文試圖從新古典現實主義，論述中美兩大國簽署 BIT 的動機與調適策略。實證結果顯示，新古典現實主義非常適用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與經濟外交政策的分析，此為理論應用上的延伸。

展望未來，國際直接投資規模還將持續擴大。根據 UNCTAD (2014a: 114-134) 的統計，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世界各國 OFDI 從 2007 年的 20,027 億美元，暴跌到 2012 年的 13,509 億美元，但 2013 年已開始復甦，爬升回 14,107 億美元。世界銀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今後 3 年（2013-2015 年），近七成的 MNEs 計畫擴增 OFDI (MIGA, 2014: 17)。這表示：BITs 的重要性還會進一步提升。

此外，我們也注意到，部分大國在既有的 BITs 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推動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MITs），例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 TTIP）。此外，歐盟也於 2009 年發布《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將以單一法人身份，代表各會員國對外簽署 BITs。但可惜的是，目前 MITs 還在起步階段——截至 2014 年底，MITs 累計為 345 個，僅 BITs 的一成左右（UNCTAD, 2014b）。因此還需一段時間，才能更清楚地釐清大國簽署 MITs 的政經動機，這值得研究學者持續追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中國商務部，2004，〈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一)〉，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626171.htm，2015/1/10。

中國商務部，2005，〈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二)〉，中國發展門戶網，http://cn.chinagate.cn/infocus/2011-05/25/content_22637377.htm，2015/1/10。

中國商務部，2007，〈對外投資國別產業目錄(三)〉，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07-03/01/content_7885434.ht，2015/1/10。

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2013，〈中國和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關於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中國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網頁，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15/1/10。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4，《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中國的對外援助〉，中國國務院網頁：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1/Document/896983/896983.htm，2015/1/10。

石洪濤，2004，〈能源安全遭遇馬六甲困局〉，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i/14549/2570978.html，2015/8/4。

江澤民，1997，〈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5.html，2015/8/4。

唐欣偉，2013，〈美國國關學界對中國之評估：以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論爲例》，《政治科學論叢》，58: 47-70。

郝亞琳、常愛玲，2014，〈李克強同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舉行會談〉，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09/c_1110623607.htm，2015/1/10。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4(2): 53-98。

張廖年仲，2005，〈從 1995-96 年臺海危機論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6(2): 185-222。

習近平，2014，〈積極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13/c_1111139161.htm，2015/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郭建中、王國臣，2013，〈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的動機與差異化戰略分析〉，《中國大陸研究》，56(4): 97-129。

童振源，2009，《東亞經濟整合與臺灣的戰略》，臺北：政大出版社。

黃智聰、歐陽宏，2006，〈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決定因素之研究〉，《遠景基金會季刊》，7(2): 139-178。

齊　彬，2008，〈胡錦濤會見哥倫比亞總統 兩國簽署促進投資協定〉，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11-23/1459548.shtml，2015/1/10。

鄭端耀，2003，〈布希政府安全戰略發展評析〉，《遠景基金會季刊》，4(2): 1-37。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44(1):115-140。

顏永銘，2013，〈民主必然促進人權？東南亞人權保障之實證分析〉，《政治科學論叢》，56: 91-118。

## 二、英文部分

Abiad, Abdul, Daniel Leigh, and Ashoka Mody. 2007.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Income Convergence: Europe Is Different*.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hlquist, John S. 2006.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Capital Flows: Portfolio and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3): 681-704.

Allee, Todd and Clint Peinhardt. 2010. “Delegating Differenc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Bargaining Over Dispute Resolution Provis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4(1): 1-26.

Allee, Todd and Clint Peinhardt. 2014. “Evaluating Three Explan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orld Politics* 66(1): 47-87.

Anyanwu, John C. 2012. “Why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 Where It Goes? New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3(2): 425-462.

Berdiev, Aziz N., Yoonbai Kim, Chun Ping Chang.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8(1): 38-53.

Berger, Axel, Matthias Busse, Peter Nunnenkamp, and Martin Roy. 2011. “More Stringent BITs, Less Ambiguous Effects on FDI? Not a Bit!” *Economics Letters* 112(3): 270-272.

Bergsten, C. Fred. 2002. “A Renaissance for U.S. Trade Policy?” *Foreign Affairs* 81(6): 86-98.

Bergstrand Jeffrey H. and Peter Egger. 2013. “What Determines BITs?” *Journ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0(1): 107-122.

Borooah, Vani K., Anastasios B. Katos, and Eleni Katsouli. 2013.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Vo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 Study of World Elections." *Public Choice* 157(3-4): 569-584.

Buckley, Peter J.,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Xin Liu, Hinrich Voss, and Ping Zheng.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4): 499-518.

Büthe, Tim and Helen V. Milner. 2008.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reasing FDI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4): 741-762.

Büthe, Tim and Helen V. Milner. 201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in Trade Agreements: Credibility, Commitment, and Economic Flow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71-2007." *World Politics* 66(1): 88-122.

CEPII (The French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14. "GeoDist." in http://www.cepii.fr/CEPII/en/bdd_modele/presentation.asp?id=6.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Chinn, Menzie and Jeffrey Frankel. 2008. "Why the Euro will Rival the Dollar?" *International Finance* 11(1): 49-73.

Choi, Seung-Whan and Yiagadeesen Samy. 2008. "Reexamining the Effec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n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4(1): 83-103.

Davidson, William H. 1980.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2): 9-22.

Destler, I. Mac. 2005.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unning, John H. 1998.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9(1): 45-66.

Egger, Peter and Michael Pfaffermayr. 2004.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2(4): 788-804.

EIA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14.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Largest Net Importer of Petroleum and Other Liquid Fuels." in 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5531.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Elkins, Zachary, Andrew T. Guzman, and Beth A. Simmons. 2006. "Competing for Capital: The Diff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60-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4): 811-846.

Engle, Robert F. 1982.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with Estimates of the Variance of United Kingdom Inflation." *Econometrica* 50(4): 987-1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venett, Simon J. and Michael Meier. 2008. “An Interim Assessment of the US Trade Policy of Competitive Liberalization.” *The World Economy* 31(1): 31-66.

Fox, John and Georges Monette. 1992. “Generalized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7(417): 178-183.

Globerman, Steven and Daniel M. Shapiro. 2003.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4(1): 19-39.

Gilpin, Robert. 2002. “A Realist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eds. Anthony McGrew and David Held. Cambridge: Polity, 237-248.

Hallward-Driemeier, Mary. 2009.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ttract FDI?” In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ds. Karl P. Sauvant and Lisa E. Sach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9-379.

Hamada, Jotaro, Henning Haugerudbraaten, Andrew Hickman, and Ilya Khaykin. 2004. “Pricing Political Risk within an Economic Capital Framework.” In *Country and Political Risk: Practical Insights for Global Finance*, ed. Sam Wilkin. London: Risk Books, 301-326.

Hausman, Jerry and Daniel McFadden. 1984.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Econometrica* 52(5): 1219-1240.

Hegre, Håvard, Joakim Karlsen, Håvard Mokleiv Nygård, Håvard Strand, and Henrik Urdal. 2013. “Predicting Armed Conflict 2010-205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2): 250-270.

Hill, R. Carter, William E. Griffiths, and Guay C. Lim. 2008. *Principles of Econometrics*. Hoboken, NJ: Wiley.

Hosmer, David W. and Stanley Lemeshow. 1982. “A Review of 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s for U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15(1): 92-106.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4. *World Energy Outlook*.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arque, Carlos M. and Anil K. Bera. 1980. “Efficient Tests for Normality, Homoscedasticity and Serial Independence of Regression Residuals.” *Economics Letters* 6(3): 255-259.

Kaufman, Robert L. 1996. “Comparing Effects in Dichotomous Logistic Regression: A Variety of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7(1): 90-109.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Kimura, Hidemi and Yasuyuki Todo. 2010. “Is Foreign Aid a Vanguar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Gravity-equation Approach.” *World Development* 38(4): 482-4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olstad Ivar and Arne Wiig. 2012.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1): 26-34.

Lampton, David M. 2008.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 Quan and Adam Resnick. 2003. “Reversal of Fortun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1): 175-212.

Markusen, Jim. 2004.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ird-Country Inward Investment.” *Business and Politics* 6(1): 1-26.

MIGA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2014. *World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Ris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lner, Helen V. 2014.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Economy, FDI, and the Regime for Investment.” *World Politics* 66(1): 1-11.

Motta, Massimo and George Norman. 1996.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u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4): 757-783.

Neumayer, Eric and Laura Spess. 2005.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33(10): 1567-1585.

Neumayer, Eric. 2006. “Self-interest, Foreign Need, and Good Governance: Ar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s Similar to Aid Alloca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3): 245-267.

Nye, Joseph S. 2003. “U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82(4): 60-73.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 *OECD Economic Surveys*. Paris: OECD Publishing.

Peng, Chao-Ying Joanne, Kuk Lida Lee, and Gary M. Ingersoll. 2002. “An Introduction 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eporting.”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6(1): 3-14.

Poulsen, Lauge N. Skovgaard and Emma Aisbett. 2013. “When the Claim Hit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and Bounded Rational Learning.” *World Politics* 65(2): 273-313.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Salacuse, Jeswald W. and Nicholas P. Sullivan. 2009. “Do BITs Really Work? An Evalu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ir Grand Bargain.” In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ds. Karl P. Sauvant and Lisa E. Sachs.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9-170.

Salacuse, Jeswald W. 1990. “BIT by BIT: The Growth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24(3): 655-675.

Sauvant, Karl P. and Lisa E. Sachs, eds. 2009.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mbaugh, David. 2005.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In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ed. David Shamba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0.

Shepotylo, Oleksandr. 2012. "Spatial Complementarity of FDI: The Example of Transition Countries."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4(3): 327-349.

Simmons, Beth A. 2014. "Bargaining over BITs, Arbitrating Awards: The Regime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orld Politics* 66(1): 12-46.

Stoian, Carmen. 2013. "Extending Dunning'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The Role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in Explaining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2(3): 615-637.

Swenson, Deborah L. 2009. "Why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Sign BITs?" In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ds. Karl P. Sauvant and Lisa E. Sachs.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37-460.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4.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9. "The Impac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BITs." In *The Effect of Treat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and Investment Flows*, eds. Sauvant, Karl P. and Lisa E. Sachs.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3-348.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4a.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4b. "Databas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United Nations. 2013. "Composition of Macro Geographical Regions, Geographical Sub-regions, and Selected Economic and Other Groupings." in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s/m49/m49regin.htm.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2a. "Shared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ttp://www.ustr.gov/webfm_send/3337.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USTR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2b.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in http://www.ustr.gov/sites/default/files/BIT%20text%20for%20ACIEP%20Meeting.pdf.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andevelde, Kenneth J.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4): 621-641.

Vandevelde, Kenneth J. 2000. “The Economics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1(2): 469-502.

Waltz, Kenneth N.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 21-37.

Warner, Rebecca M. 2008. *Applied Statistics: from Bivariate through Multivariate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White, Halbert. 1980. “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or and a Direct Test for Heteroskedasticity.” *Econometrica* 48(4): 817-838.

World Bank. 2013. “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in http://data.worldbank.org/news/new-country-classifications. 2014/12/19. Latest update 10 January 2015.

World Bank. 201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Yackee, Jason Webb. 2008.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redible Commitment, and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 Do BITs Promo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w & Society Review* 42(4): 805-832.

Zafar, Ali. 2007. “The Gr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Macroeconomic, Trade, Investment, and Aid Link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7(1): 103-130.

Zakaria, Fareed. 1998.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oromé, Ahmed. 2007. “Concept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s: In Search of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MF Working Paper* 7(87): 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Key Factors for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 Political Pressure or Economic Interests?*

*Jiann-jong Guo*** & *Guo-chen W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d the panel data logit model (PDLM) to determine the ke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tivations for major countries to sig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with 102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search objects cover six major countries, namely China, France, German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udy period is from 1987 to 2012. Some of the major findings are listed below. Firstly, competitive pressure is the number one reason why major countries are motivated to sign BIT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followed by the host countries' econo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i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bviously, political pressure outweigh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s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for a major country to sign BIT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Secondly, major powers are competing in the signing of BITs due to their self-awar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 example, by singing BITs, the United States aims at setting a standard on the BIT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us, the number of BITs is not the main factor that compel the U.S. to sign BITs. On the contrary, China fears that BITs inked by other major countries would generate an investment diversion effect, which would interrupt its energy supply chain and essentially its sustainable

* DOI:10.6166/TJPS.65(31-70)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jj03082011@gmail.com
*** Post-doc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Academia Sinica.
E-mail: 97261502@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velopment. So, even though the number of BIT that China has inked is already the second highest in the world, China still has pressure to sign BITs, especially with most of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Keywords:** Major Country's Competition, Major Country's Economic Diplomacy, Panel Data Logit Model, Neoclassical Realism,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